



大别山精神映红鄂陕边

■ 李仁喜

1934年11月16日,一支近三千人的红军队伍高举“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”的旗帜,肩负创建新的根据地的使命,从大别山地区出发,沿途冲破敌人30多个团兵力的围追堵截,转战湖北鄂西、陕西商洛一带,在鄂陕边完成对敌两次反“围剿”,成功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。红二十五军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部队,被毛泽东誉为“中央红军之向导”。在长征和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,红二十五军出奇制胜,屡获建树,完美诠释了大别山精神的内涵。

坚定信念,战胜一切艰难险阻

红二十五军从初建、重建到长征结束,先后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、鄂豫皖省委、鄂豫陕省委直接领导,没有单独成立军党委。据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》记载:“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,大多数是省委的成员,或者是省委的主要领导者。省委对部队实行直接领导。一切重大问题都是由省委决策,军领导执行。这就从政治上、思想上、组织上把红二十五军紧紧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。”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下,红二十五军坚定信念,取得长征和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胜利。

1934年初,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鄂豫皖苏区进行“围剿”。面对不利局面,中共中央两次向鄂豫皖省委发出“战略转移”的指示。8月底,党中央派程子华来到鄂豫皖,带来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令和中共中央《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》。11月16日,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,孤军远征,去建立新的根据地。

当时,这支队伍中年齡最大的34岁,多数是十四五岁的少年兵,在长征中,这支队伍遭遇了重重困难。但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,大家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,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。

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第一目的地是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,到了后发现不宜建立根据地,省委及时决策,向北挺进位于豫西的伏牛山区。

入陕前,国民党反动派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围追堵截,部队行军困难。省委及时召开会议,研究对策。在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,队伍遭遇敌人前后夹击,天降冰雨,冻得战士们连枪栓都拉不开,关键时刻,军领导吴焕先、徐海东带头冲锋,实现突围。

进入伏牛山区后,红二十五军发现这里也难以建立根据地,于是省委再次决策,向鄂陕边挺进,并及时发出向陕南、鄂西进军的动员《布告》。

在河南省卢氏县,面对敌人围堵,红二十五军巧寻对策,从十几公里的险峻峡谷中穿过,直插陕南,实现了长征第一阶段的胜利。

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,红二十五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两次大规模“围剿”。在秦岭大山中,省委带领红二十五军同敌人周旋,分别取得了庾家河、石塔河、蔡玉窑、文公岭、九间房、袁家沟、荆紫关等几十场战斗的胜利。

鄂陕交界处是秦岭的重重大山,条件十分艰苦,这支年轻的队伍多数时间在夜

里行军,只靠两条腿穿行于山岭间,但没人叫苦,没人当逃兵。1935年6月,荆紫关战斗结束后,部队在烈日下急行军,穿越鄂陕大峡谷,疾行60多公里。

红二十五军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,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、依靠群众。1935年2月的鄂西会议上,针对当地春荒严重的困境,提出要“扩大斗争的区域”“打到富足地方去”,以求部队发展、补充物资和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。红二十五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,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、一针一线。在鄂陕边,为了不惊扰居民,部队



1935年2月19日,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郧西县庙川(今湖北口回族乡)虎坪村油池张家大院分析形势。这次会议被称为郧西会议。李仁喜 摄



1934年12月至1936年12月,红二十五军和鄂陕各路游击师、回民游击队以及红七十四师先后转战于鄂陕边的湖北关,燃起了熊熊革命烈火。李仁喜 摄

常常露宿野外。行军途中,口渴难忍,有的战士拔了群众的萝卜吃,来不及找主人付钱,就在每个坑里放一枚铜板。每当部队在行军时遇上群众,总会主动让路。红二十五军处处为群众着想,当地群众也主动为红军治伤、带路、放哨、提供情报,演绎了一场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故事。

1935年5月初,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,涉及鄂豫陕边20多个县,红二十五军队伍扩大到3700余人,游击武装2000余人。

胸怀全局,始终锚定胜利方向

红二十五军长征,是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总体部署下进行的。长征路上,他们心中时刻想念着党中央,将自己的长征置于全国革命形势之中。创建根据地的同时,他们为中央红军、川陕根据地、陕北根据地分忧,将国民党反动派二三十万兵力牵制在鄂豫陕边区。据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》记载,在得知中央红军北上陕甘之时,红二十五军自主作出决定:“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,决定挺进甘肅,北上陕北,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。”

初进鄂陕边时,有就创建根据地和西进川陕两种发展路线的争论,关键时刻,以吴焕先、徐宝珊、徐海东为代表的省委和军队领导,胸怀全局、高瞻远瞩,他们站在全国、全党、全军的角度来看待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和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,坚持就地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。政委吴焕先认真分析,耐心解释,在省委会议上,坚持了正确的观点,通过决议,统一了思想。吴焕先以“香炉脚”作生动比喻,耐心说服主张入川的同志。

所谓“香炉脚”理论,即一只香炉三只脚,最具稳定性。吴焕先提出建成鄂豫陕革命根据地,可与川陕、陕北两根据地共同组成稳定的三只“香炉脚”,彼此支援,分散敌人进攻力量,对三块根据地的发展都是有利的。实践证明,他的这种理论是正确的。

1935年7月15日,在陕西省长安县沔峪口,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有北上动向时,省委立即召开会议,决定主力西进北上,迎接中央红军。出发后,把国民党反动派原本调去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吸引到自己身边,截断西兰公路18天,打乱了敌人在这一地区的兵力部署,为中央红军北上减轻了压力。

1935年9月15日,红二十五军先行抵达陕北,与红二十六军、二十七军合并为红十五军团,巩固壮大了陕甘根据地,为中央红军北上当好了“向导”。

红二十五军正是有这种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,在长征中把自己作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一枚棋子,始终锚定革命胜利的前进方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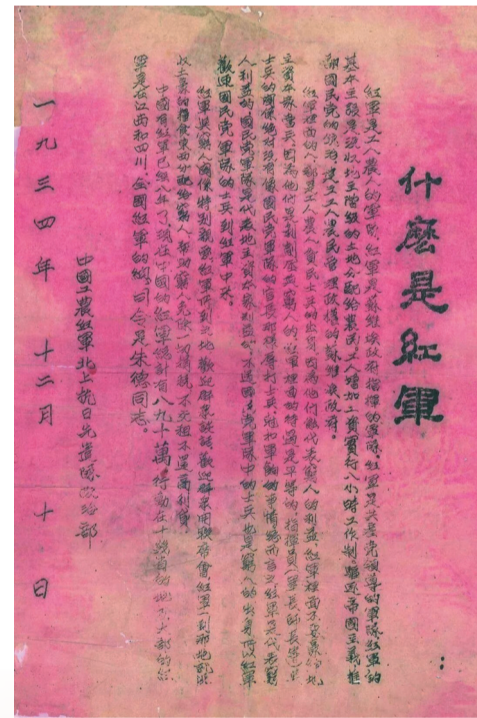
团结奋进,充满强大的战斗力

团结出战斗力,在红二十五军得到真实体现。

红二十五军的团结来自官兵平等。据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》记载:队伍“认真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,使指战员之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。”广大干部吃苦在前,冲锋在前,处处起模范作用。在鄂陕边时生活异常艰苦,军首长与战士同甘共苦,常把自己的骡马让给伤病员骑,把自己的饭食送给伤病员吃,有的还亲自

用南瓜瓢为伤员敷伤治疗。《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》中记录,鄂陕边游击战争十分艰苦,担任鄂豫陕特委书记的郑位三病了,警卫员把炊事班仅有的一点油辣子拿来给他下饭,郑位三认为自己搞了特殊化,随即在部队全体战士前作深刻检讨,这件事令全军战士深受感动。

红二十五军的团结来自部队领导及干部以上率下的作风。凡是要求战士和下级做到的,自己首先做到。外出筹集粮食回来时,背得最多的是干部。庾家河战斗中,程子华、徐海东、吴焕先各带一团,冒着枪林弹雨冲锋,沉着指挥部队作战,两千余官兵同仇敌忾,打退敌人一个师的兵力。军领导和各级干部爱护部属。据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》记载:“在行军中,军领导帮助战士背枪、背背包。到了宿营地,他们烧水给战士洗脚,督促和帮助战士放脚泡、打草鞋,为战士理发,关心照顾伤病员。”在独树镇战斗中,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,吴焕先带头冲锋,徐海东副团长亲自抬担架运伤员。战士们也十分尊敬干部。全军同志之间十分友爱,愈是困难,愈是同甘共苦。战斗再激烈也不丢下伤员,对烈士的遗体尽力掩埋好。全军上下,风雨同舟,生死与共,情同手足。



《什么是红军》宣传传单。这份传单是全国仅存完好的一张,是郧西县作为革命老区的重要凭证。(资料图片)

红二十五军的团结来自严明的纪律。红二十五军纪律十分严格,赏罚严明。对作战勇敢、表现突出的战士,大胆提拔,甚至越级提拔。对犯了错误的,不管是哪一级干部,都坚决执行纪律。受处分后改正错误表现好的,还可再提升为干部或官复原职。这对干部是强有力的鞭策,也使部队树立了坚决执行命令,认真负责的良好作风。对个别违犯群众纪律、损害群众利益的,一定追究责任,要向群众道歉,赔偿损失。在郧西县二天门,军部经理处一名战士违反财经纪律受到严厉处分。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地区就有不吃鸡的习惯,认为吃鸡杀鸡,撵得鸡飞狗跳,群众看了不好。在长征路上和鄂陕边受到纪律处分的红二十五军战士有二三十名。

红二十五军的团结来自队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。领导者之间在重大问题上常有不同意见,甚至发生争论,但都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,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,集体作出

决定,共同遵守执行。领导成员之间,坦率诚恳,不抱成见,识大体,顾大局,团结一致,共同对敌。红二十五军初入鄂陕边时,困难重重,从领导到普通战士不少人仍存有“入川”的想法,在省委会议上,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主动做自我批评,会议坚定了就地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想法。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,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,保证了集体领导的坚强团结。

勇当前锋,创造战斗奇迹

红二十五军是以黄(安)麻(城)起义、商南(商城南)起义和六(安)霍(山)起义的一部分工农武装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支主力红军,在党的领导下,长期在鄂豫皖同敌人斗争中,形成了一种“不怕流血牺牲,不怕艰难困苦,前仆后继,英勇顽强,服从命令听指挥”的品格。

红二十五军不仅继承了鄂豫皖红军的优良传统,而且在实战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战斗作风。进攻时,动作迅速、突然、勇猛,使敌人措手不及,一举而歼灭之;防御时,不畏强敌,不怕敌人的连续冲击,敢于和敌人白刃格斗,并伺机转守为攻;转移时,吃苦耐劳,克服自然险阻,且战且走,迅速持久,使敌人追不上,堵不住。总之,这种战斗作风,使红二十五军进攻时有强大的突击力,防御时有坚韧的抗击力,转移时有坚强的行军力,在艰难困苦面前有惊人的忍耐力。

在独树镇战斗中,部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,关键时刻,政委吴焕先抽出一把大刀,高喊:“共产党员跟我上!”带领战士冲锋陷阵,出奇制胜。

在庾家河战斗中,程子华、吴焕先、徐海东各带一支队伍率先冲锋陷阵,程子华、徐海东身负重伤。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在率领部队和敌人拼刺刀时,一条腿被砍断,仍坚持指挥作战。军部司号长程玉林,不顾轻伤,不能吹号,便利用一座小庙作为掩护,接连向敌人投出数枚手榴弹,最后壮烈牺牲。

从红二十五军成立到长征结束的四年间,历任省委书记、军长、军政治委员的九人中,有2人积劳成疾早逝,3人壮烈牺牲,3人负过重伤。

红二十五军就是靠这种精神,迅速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,在秦岭山区与国民党反动派二十余万兵力周旋,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斗奇迹。

1934年12月至1937年8月,“大别山精神”映红的鄂陕边,先后有5000多人参加了红军,根据地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拥护和支持红二十五军在根据地的斗争。1934年12月至1936年12月,红二十五军和鄂陕各路游击师、回民游击队以及红七十四师先后转战于鄂陕边的湖北关,燃起了熊熊革命烈火。1947年,在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下,人民解放军在地方游击武装的积极配合下解放了鄂陕边,郧西成为湖北解放第一县。解放后,在党的领导下,这里蒸蒸日上,日新月异,红色人物不断涌现,这片土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刘华清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红二十五军的长征:“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党的领导、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;不惧强敌,英勇善战,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;勇于牺牲,战胜困难,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;顾全大局,严守纪律,紧密团结的高尚品德;艰苦奋斗,联系群众,勇于奉献的崇高思想;独立斗争,孤军北上,敢为先锋的求索精神。”这正是“大别山精神”的内涵。